



海派文化丛书

钱勤发著

海派大律师

 文匯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大律师

钱勤发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大律师/钱勤发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8. 8

(海派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41-379-0

I. 海… II. 钱… III. 律师—简介—上海市 IV. 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375 号

海派大律师

作 者 / 钱勤发

丛书主编 / 李伦新

责任编辑 / 陈润华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

印 张 / 20.7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379-0

定 价 / 36.00 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方明伦 邓伟志 庄晓天 严家栋
吴谷平 徐中玉 钱谷融 龚心瀚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丁宏根 王晨 李伦新 李友梅
忻平 陆廷 郑家尧 桂国强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

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四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

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

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

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平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

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伟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illegible]

[Home](#)
[About Us](#)
[Contact Us](#)
[Privacy Policy](#)
[Terms of Service](#)
[FAQ](#)

[illegible]

有人说,我最有资格写这本书。持这种绝对话语的当然是熟悉我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文汇出版社的社长桂国强。他逼我“干活”,说些客气的话、友好的话、鼓励的话,本在理义之中。

其实,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很多,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既然一定要我写,那就试试吧。我知道自己是个“劳碌命”,半截子入土还未捞着个轻轻松松过日子。须知,这一试,可是一本书啊,分量很重,定会压得我半年喘不过气来。我不是专业作家,还没有退休,还有记者职业,更有育儿的重任,“四面楚歌”之下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我并不讨厌这本书。我觉得有责任写好这本书。因为,凭着27年记者生涯的积累,凭着与这些大律师的接触交往,凭着他们在我笔下的报道文字,还有,凭着许多大律师将我视作推心置腹的朋友,这都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熟知他们的人品,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辩护技巧和辩护特色,他们对社会、对民众的责任,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作用,乃至他们的情趣爱好……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树碑立传”,没有理由将这些让我敬重的大律师“拱手相让”。我本是“写字”的命,有生之年还能经受得住这份“煎熬”——为了树立我们这座城市的律师形象,为了这些大律师流芳百世。当然还有,不能辜负朋友桂国强社长对我的信任。

上海的律师业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早在1869年,上海租界就出现了外籍律师,由此标志上海是中国律师的诞生地。1912年,上海留日法科毕业生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并经上海都督批准,律师可以出庭办案,这是近代意义上律师组织的开端。当时有律师近百人。到了解放前夕,律师公会已有会员1347人。大律师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张志让、章士钊等都曾在上海执业,为后辈律师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立民撰文回顾说,1933年,史良律师挺身而

出,为艾芜和其他六位工人讨回公道。当时,艾芜是“左联”作家,在上海曹家渡一家丝绸厂与工人们商量事宜时被特务抓获,同时被捕的还有六位工人,起诉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史良律师担任了他们的辩护人,为他们讨回公道,帮助他们成功出狱。艾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因为有史良的出色辩护,“结果我和六个工人都得到了自由”。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例。1936年,居住在上海的爱国人士“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因所谓的“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等罪名遭到逮捕。上海律师张志让、陈霆锐、俞钟骆等担任“七君子”的辩护人。他们深明大义,以抗日爱国有功驳斥国民政府的“爱国有罪”,同时揭露政府当局捏造事实、陷害爱国人士的险恶用心,成功的辩护为社会各界营救“七君子”大造了声势。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了爱国的“七君子”。还有吴凯声律师的大名让陈赓将军念念不忘。事情发生在1933年3月,由于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王其良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致使陈赓在上海被捕。消息传出,中共地下党立即开展营救,并委托宋庆龄聘请律师。宋庆龄选择了曾为陈延年辩护的吴凯声律师。吴凯声在法庭上将公诉人驳得体无完肤,迫使法庭不得不休庭。通过富有成效的合法斗争,陈赓将军终于脱险,同年回到中央根据地。1955年,陈赓将军回忆这段历史时说:“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员辩护。”

播火传薪,继往开来。历史注定选择上海这座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全国律师业发展的重镇。1956年,上海成立律师协会筹备会,下设六个法律顾问处,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有近两百人,实属全国仅有。反右以后的1959年,上海律师机构遭受重创,被全部撤销。1980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上海市律师协会相继成立,当时设立上海市第一、

第二两个法律顾问处。次年,我考入复刊前的新民晚报,任政法记者,就此与律师结下不解之缘。

我记得,当时第一法律顾问处在中山南二路,第二法律顾问处在四川北路。这两个地方我不知去过多少次,先后结识了李国机、郑传本、傅玄杰、赵圭、王珉等前辈律师。他(她)们都进入过我的报道文字。后来,从青年成长为中年的朱洪超、陶武平、江宪、鲍培伦、吕红兵等这些律师界的中坚,也被我悉数书写。现在,上海有 788 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有 8000 多人。

《海派大律师》一书,顾名思义,写的是人物,写的是上海大律师。大与小是相对的。所谓大律师,我想,除了资历、阅历、年龄之外,最重要的不外乎有这么几个条件:其一,有出庭辩护的丰富经验;其次,办过相当数量的大案、名案、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其三,在市民中广有影响有口皆碑的,也就是知名度;其四,在同行中被广泛认可的。此外,我还为海派大律师圈定一个地域范围——上海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律师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作为海派大律师,本书主角 80% 出生在上海,也就是上海人,或称老上海。此外,还有在上海求学、在上海踏上工作岗位、事业成功在上海的大律师。我所选择的案例、故事当然绝大部分也都是发生在上海的,力求海派特色。而且,我将时间、空间的舞台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 1980 年上海市律师协会成立至今、改革开放 30 年里,这恰是我当记者接触律师到现在的时期。这 30 年里,尤其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上海律师活跃程度最大,影响最为深广。当然,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也有,那就是李国机大律师在上世纪 50 年代反右前夕,承办的那起轰动上海的颇具海派特色的“四明堂案件”。

鉴于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我选择了李国机、郑传本、傅玄杰、朱洪

超、陶武平、江宪、鲍培伦、翟建、朱树英、吕红兵这十位律师作为我这本书的主角。这些大律师，绝大部分是我熟悉的，我曾多次在庭上听他们辩护，有不少还是我在媒介中“树”起来的。尽管如此，在写这本书之前，我还是一一重新采访了他们。纵是李国机已经去世，我也采访了他健在的妻子王佩珠，以及他的女儿李钧。有的还先后采访两次，比如郑传本、翟建、朱洪超。27年的记者生涯告诉我，唯有采访深入，才能写出这些大律师的丰采和特色。

当然，老一辈的律师中还有韩学章、王文正、张中、李树棠、陈瑞谟、杨志鳌、戴绿绮、叶松亭等人，他们在上海也是让人敬重的大律师。但是，他们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成为政府官员，有的知名度不及李国机、郑传本、傅玄杰他们，所以，本书没有选入，待以后有机会再一一书写。

在这半年里，凡双休日，我都去“锦江之星”开房间写作，很苦，很累。但，很愉快，也很激动。这些大律师的个性、人品、素养、能力，以及许多精彩的案例，令我钦佩，令我感奋。我有理由这么说：这些大律师是改革开放30年海派律师的标志性人物，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

本书完稿前，惊闻“五·一二”汶川大地震，近7万人遇难，神州悲泣，举国哀悼。上海律师同献爱心，捐款近800万元。我想，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是人类最高的情怀。海派律师已经走向全国，且声望日高。他们在法律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同时也播撒着爱的种子。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各位大律师的积极配合，也得到上海市律师协会秘书长万恩标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钱勤发

2008年7月18日